

中国

在国际竞争压力下的 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熊贤良 著

重庆出版社



中国

在国际竞争压力下的 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熊贤良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在国际竞争压力下的经济发展路径选择/熊贤良 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ISBN7-5366-6271-8

I.中... II.熊... III.对外贸易-研究-中国

IV.F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6091 号

中国在国际竞争压力下的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熊贤良 著

责任编辑 罗小卫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聂丹英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97 千 插页 4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5366-6271-8/F·304

定价:20.00 元

序

陈锡文

在当今世界,中国是一个有着自己特殊国情的国家,在资源禀赋、历史传统、人口规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特征都比较突出。这决定了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由不发达达到发达的进程,除了遵循先进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共同规律外,还会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新中国在经历了大约30年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而步入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继在上个世纪末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后,目前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20多年来,中国一方面借鉴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成功运用市场机制,激发出全体人民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加速了自己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以创新的思路、创新的战略、创新的政策和创新的体制,着力解决大量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独特挑战和问题,成功消除了诸多影响发展的障碍。

中国颇具特色的转轨之路,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引起了许多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致力于中国体制改革、经济政策、发展战略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熊贤良同志这本书,汇集的就是他在90年代,以国际经济学的视角,联系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围绕“中国经济发展路径选择”的主题,而连续完成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这些文字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他由重点大学国际经济专业的研究生成长为国家政策咨询机构研究员的过程。在这里,我不想对他的观点做出具体的评价,只想强调一点:他在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的对外

开放战略时,十分注意结合中国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内区际贸易不发达、国内市场规模和需求潜力巨大等方面的国情,这是值得大力提倡的科学态度。我相信,在中国,有许多问题是靠照抄理论模式或者照搬别国做法难以奏效的。只有真正把握住中国的基本国情,才能更好地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总结出符合中国特殊发展道路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希望熊贤良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能继续过去的研究,并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2003年7月1日于北京

内 容 提 要

后进国家在已有一大批先行国家的国际环境中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这些先行国的竞争压力。如何处理与这些先行国的经济关系,首先是贸易关系,是后进国选择发展战略时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大国,如果在改革没有完成、国际竞争力尚未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当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来临时,就轻易放弃最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战略,将可能对自己的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铸成“历史性错误”。

传统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以国内贸易机会的完全被利用为前提,考察对外贸易的影响,并得出支持实行自由贸易的结论。对于国内贸易机会未被充分利用的国家而言,它舍弃了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可互相替代。二是发展国内贸易对提高国际竞争力有促进作用,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有互补关系。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而降低。寻求中国在贸易战略乃至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上的正确答案,要以更切合实际的理论作为依据。本书围绕“中国最佳经济发展路径选择”这一主题,结合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后进国面临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剧的国际环境,结合中国由封闭型计划经济向开放型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双重转轨”的特点,以及因为市场体制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而导致作为一个大国未能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巨大潜力的现实,得出了许多对中国当前和今

后的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提出了许多具有坚实理论和丰富事实依据的政策建议。

一、政府和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

国际贸易机会具有稀缺性,国际竞争致使这些机会在各国之间的分配不平衡。国家竞争力需通过企业的竞争优势表现出来。哪个国家企业拥有的竞争优势越多,哪个国家获得的贸易机会也越多,就能得到更多的来自贸易的利益。

对于企业而言,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没有本质差别,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也不会有本质的改变。那些国际竞争中的成功者,常常首先是国内市场上的成功者。不懈的创新是它们成功的共同奥秘。

由于缺乏竞争优势,一国的比较优势产品会无法出口到别国市场。由于有很高的竞争力,一国的比较劣势产品也可能出口。因此,要实现由比较优势所确立的贸易型式,实现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结合,还必须考虑能影响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政策和企业活动。无论是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的政府政策和鼓励企业的各种创新活动,都有助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任何一个追求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都不能仅仅把自己的竞争优势建立在当前资源禀赋的基础上。鼓励创新活动的制度安排和促进国内竞争的措施,对于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提高,对于未来优势的培育,都是必不可少的。任何国家要想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改变贸易型式,就必须首先改变生产结构,大力进行纵向增长,扩展产品空间,同时必须在新增加的产品上拥有与竞争对手相比的竞争优势。

在许多行业和产品上,发展中国家都是后来者,缺乏竞争优势。有三种国际竞争战略可供选择:一种是通过吸收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入到这些行业 and 产品的跨国公司内部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去。第二种是直接通过独立的外部市场交易进入国际市

场。第三种是首先在国内市场上创造有利于本国企业建立、发展和与国外企业竞争的环境,充分利用国内贸易机会;然后通过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促进本国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在兼并和重组的基础上获得规模经济;在初步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后,扩大出口,进而组建自己的跨国公司,控制贸易活动,通过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的结合,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和贸易利益。对于中国这样国内贸易和市场潜力较大的后进大国,适合于选择第三种战略。

国际竞争的环境对中国政府经济作用领域的要求,同当前中国经济循环的状况及中国所处经济增长阶段对政府经济作用领域的要求是一致的。集中在实现并保持经济的良性循环方面以及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扫清障碍、创造条件方面。

二、中国作为后进大国的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像中国这样的后进大国,在面临来自大批先行国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进行发展路径选择时,一定要有大国意识,不能照搬小国或地区的路径。

中国不同于小国的重要方面是: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由于人口众多,国内消费、需求和市场规模都更大,拥有更多的国内贸易机会,国内需求和国内贸易可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中国许多产品的国内市场巨大,使得通过国内竞争特别是区际竞争,也能够维持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国内竞争可代替国际竞争的部分作用,抵消限制国际竞争向国内的传递带来的损失,降低保护国内市场的成本。

作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核心的“比较优势战略”的实质,是要求一国按它所面对的环境的相对价格,而不是自己的相对价格,调整生产结构。既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又利用作为其环境的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战略能够成功地引致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本国资源流向比较优势产业,经济活动和产业结构偏向于比较优势产业,比较优势产业成为出口产业。如果不考虑因政

府政策或市场不完善而扭曲价格,使比较优势得不到充分反映的情况,以相对价格未被扭曲为前提,可以肯定,在这一过程中是出口产业的发展引致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过去,一些发达小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通过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

中国之所以很难通过实施比较优势战略而充分“复制”它们的成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受体制因素的影响,一些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没有竞争优势,不能成为出口产品。第二,总的经济规模比这些小国(地区)大得多,出口产品的绝对数量也常常较大,在外部需求总量的约束下,比小国更容易成为别国保护政策的作用对象。第三,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规模较大,出口所占比重较低,出口能带动的经济增长规模有限;持续发展有赖于纵向增长和横向增长同时发生,很难像小国那样“幸运”——仅靠一种或几种产品出口量的增加就带动显著的经济增长。

前些年在中国倡导比较优势战略的学者们的意图在改革方面。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而言,维持一个富有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这种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对于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技术、外汇同样适用。改革发展到1992年确立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后,学者们已不必对市场化的必要性进行“曲折”的论证。国际竞争的介入,进一步宣告了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迫切性。在国内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又面临强烈的国际竞争压力并且有失去国内市场的危险的现实情况下,那些既有助于市场机制的完善,又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措施,比如降低国内交易成本、大力发展国内区际贸易、促进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措施,都应该占有优先权。从中国最显著的具有比较优势、最容易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开始“边干边学”的过程,无疑是正确和有益的选择。同时,对于经济发展的持续而言,那种鼓励人们把开始时获得的利润用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进行各种创新活动的

制度安排,也是必不可少和重要的。因此,对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总体经济的长期、持续、快速发展而言,仅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and 出口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在更多的没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上,中国首先将面临的是保住国内市场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出口去占领别国市场的问题。中国实行这种保护本身不是目的。通过发展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维持国内市场的竞争性,推动经济发展,才是关键。换言之,要在适当阻止和调节市场力量的跨国自由作用的同时,维持一个国内自由贸易和竞争的环境。这两者并不是自相矛盾的,而是可以互相协调的。这样做,是为了让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很“幼稚”的时候免受“强敌”的伤害,等它们足够“强壮”之后再去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

另外,中国在有一批先行国作为竞争对象的环境中发展经济,在相当长时期里,都将是一个“学习”和“模仿”先行国特别是“边干边学”的过程,而信息的自由流入将有助于“学习”活动。比起产品市场的开放,在信息全球化的新时期,对外来信息采取开放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

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发展是否平衡的问题,对于发展中的大国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常常是大国相对于小国的一个普遍问题。在许多大国发展的历程中,都出现过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地区间的不平衡状态最终会回到平衡状态。即便地区间的初始条件不同,生产要素的分布不均匀,经济系统特别是要素市场中的自动调节机制将保证区际平衡发展的实现:其一是生产要素的跨区自由流动,促使地区间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导致区际平衡发展。其二,即使生产要素不能跨区自由流动,各地区内生产要素的跨行业自由流动与产品的区际自由贸易相结合,也会导致地区间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据此,只要伴随着区际分工和贸易出现区际不平衡发展,是各个层次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是效率导向的经济活动空间选择引起的,而不是政

府的差别化政策引起的,就没有必要为这种不平衡担忧,甚至也不必为此而专门采取收入跨区再分配的政府政策。维持统一、高效的全国性产品和要素市场才是关键。那种通过每项经济活动在地区间的均匀布局来实现区际平衡发展的战略,结果是不理想的。不仅由于一些地区从事了不恰当的经济活动,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低下,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而且由于要素生产率的区际差异大,也不能实现区际平衡发展。这是中国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深刻教训。今后需要通过国内统一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大力发展区际贸易,促进区际分工的形成,把区际平衡发展建立在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和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的基础上。

三、体制转轨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动力

一个典型的由传统农业部门占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要达到资本存量大幅度增加和资本投入增长放慢、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完毕和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显著增加、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生产率提高的发达状态,需要通过一个相当长的经济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物质资本投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得比较突出。大量计量分析表明,中国在过去20余年的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格局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是吻合的。

在这期间,中国改革真正的成功之处,是实现“改革”与“高速增长”的结合。由农村改革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大量转移到农村非农业部门,主要是乡镇企业,进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增长显著放慢之后,促进劳动力相对更多地流向城市非国有部门,适应了中国所处经济增长阶段的特点,把“农村劳动力再配置”这一潜在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释放了出来。较广的经济增长受益面反过来证明了改革的“合法性”,使改革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对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由资本积累驱动

的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继续发展的阶段远未结束;并且在该阶段,不排除全要素生产率因为改革导致的激励加强,因为资源的流动、因为技术进步以及伴随企业兼并重组、区际分工、城市化而来的各个层次规模经济,有显著的提高并继续对增长做出贡献,使经济仍处于与前20多年接近的高速增长阶段。

中国存在通过完成经济体制转轨,激发出新的资源再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大量空间,主要包括:彻底消除城市化进程中的障碍,让农村劳动力等资源更自由地流向现有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及新城市的建设;加大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改革的力度,促进非国有企业进入城市金融、保险、信息服务、传媒等第三产业,及目前国有企业仍占主导地位的第二产业部门,真正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加快发展区际分工和贸易,构建和完善全国统一市场的通信、交通、法规等软硬基础设施,彻底实现全国各地地区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的一体化,努力形成东、中、西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城市化与非农产业之间,协调发展、同步发展的格局。

中国与国有经济相关的问题存在于三个层次:国民经济——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对应的解决思路也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在不改变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情况下,从单个企业着手转制,建立合理的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另一种是不改变目前国有部门在整个社会资源控制格局中的地位,在国有部门内部来解决国有经济的问题,如增加国家财政在企业资本金方面的投入、在国有企业之间进行重组等。第三种是通过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调整国有部门在整个社会资源控制格局中的地位,确保国有部门退出适合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领域,促进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共同发展和相互融合,实现全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达到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目的。第三种思路从最高层次入手,有助于构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并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经济的问题,是最佳选择。

四、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动力

进口和出口有多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这些机制要顺利发挥作用,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比如:企业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全国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统一的而不是分割的;本国人和本国企业,而不只是外国人和外国企业,能够获得来自对外贸易的利益;贸易量必须足够大,贸易扩展持续的时间足够长,以保持对国内经济持续的、足够力度的刺激等等。通过对多个国家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历史的考察,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国家的大小和国内市场规模的差异,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促进作用的大小是很不相同的。综合起来看,比较成功地利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类型有三种:第一类,以初级产品的出口带动和支持整个经济的增长。这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小国的情况。第二类,以制成品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这主要发生在自然资源比较贫乏、制造业发展比较成功的小国和地区。第三类,以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润滑油”。这是对外贸易在国内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所起的作用,比如历史上的美国、德国和日本,它们都成了当今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这类国家由于国内市场规模较大,国内需求和竞争往往能够支持多种产业的成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就没有小国那么强烈。因此,在形成国内统一市场过程中,国内投资和私人消费的扩张,构成了刺激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美国、德国和日本历史上的经验值得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借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对外贸易所能发挥的作用,不会有小国那么重要。中国国内市场庞大,国内贸易机会众多,不必像小国那样过多地依赖国外市场,就能实现同样的发展。与小国相比,多了一种发展战略选择。对中国而言,对外贸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加速发展、便利发展上,这种作用的前提是避免因对外贸易而受到伤害。

当中国从封闭的计划经济出发,向着开放型市场经济目标迈

进时,需做的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改革,建立包含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经济制度,消除国内经济中的各种扭曲。二是通过开放封闭着的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实现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从时序上看,做这两个方面的事,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一是先开放,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奉行市场经济的原则,后改革国内经济体制。二是先在封闭的情况下,通过改革建立国内的市场经济体制,然后,通过开放向开放型经济过渡。三是同时进行改革和开放。最优的组合是同时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向开放型经济转轨,但在两类转轨的节奏上,必须这样把握:加快在国内经济活动中贯彻市场经济原则,尽快建立起完备的国内市场体系,逐步实现向开放型经济的过渡。

那种“不改革只开放”的倾向是十分危险的。获得开放的利益不是无条件的。中国的国内体制不进行市场化改造,要充分获得开放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交易对手绝大部分都是严格遵循市场原则的,也即“理性的”,中国除了把自己进入国际市场的交易主体也都改造成“理性的经济人”外,并没有别的更好方法来保证获取来自开放的利益。要让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对手来保证中国的利益,恐怕与“缘木求鱼”、甚至“与虎谋皮”无异。中国企业“与狼共舞”而“不被狼吃掉”的最好办法,恐怕还是先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就成为同样的“狼”,甚至“比狼更厉害的动物”。

在中国,“开放可以促进改革”的观点也十分流行。但这并不是改革与开放关系的全部。绝不是只要一开放,中国就有了实行正确改革的动力。近代以来,在相同的、来自先进国家的竞争压力面前,许多落后国家有不同的回应模式,结果也不同:既有像日本那样通过加速内部改革,而成功实现对先进国家赶超的例子,更有许多极为开放而不事改革的殖民地,陷入了长期的落后和“依附”境地,即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中国自近代以来,在面临先进国家冲击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反应,有的顺应了现代化的趋势,有的并没有,而是逆潮流而动,更为此提供了佐证。

五、金融危机的防范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曾发生过多次银行危机或国际收支危机,但像90年代墨西哥、泰国两国这样,由银行危机迅速扩展为银行、货币双重危机的情况还比较少见。它们的教训十分深刻,值得中国吸取。

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无论是从国际竞争压力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金融和企业体制,还是从宏观经济管理,特别是汇率和外债管理的角度看,都有其内在必然性。

中国避免货币危机的关键,在于维持合理的国际收支平衡模式即外部平衡模式。其要点包括:首先,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进行经常项目交易自由化的同时,不能放弃对资本项目交易的严格控制,以避免因资本流出和流入的不平衡,引起经济的外部不平衡。第二,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的目标应是:在对外贸易活动显著自由化后,把维持经常项目收支、主要是贸易收支平衡的任务,交由外汇市场完成;政府不再设定汇率目标,也不再把它作为调节经常项目收支的一个政策工具,保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让汇率的浮动把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消灭在刚刚开始显露的阶段。第三,改进对资本项目的控制,要有针对性地把控制重点,转向防止各种形式的资本外逃、以经常项目名义进行资本项目交易,以及虚假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债要控制其规模,并保证用于促进出口,或替代进口的生产项目,而不是消费特别是进口品的消费。第四,在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关系方面,以内部平衡为基础;一旦内部平衡被破坏,外部平衡的维持就会有困难,以牺牲内部平衡的方式维护外部平衡,一般是不可取的;但无论是外部平衡还是内部平衡,都应服务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的这一目标。

在中国,改革金融体制,防止银行危机,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能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中国银行系统累积的大量不良资产不是

一个新问题,与长期以来政府投资所形成的大批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改革以来调整国有企业与财政和银行的关系,以及银行体系本身的缺陷等方面都有关,而不只是各个银行内部管理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降低银行体系所面临的风险,不仅需要加快银行体制的改革,让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各显其能、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各司其职,减少新的银行不良资产出现,而且有赖于整个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国有企业与银行关系的调整,及其资源配置效率的普遍提高。在整个过程中,都不能松懈对银行危机的防范,特别要注意防止商业银行的资金过多流入容易形成“泡沫”的房地产业和股票市场。同时,要注意把握好国内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开放的步伐和顺序,在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再考虑对外国投资者大规模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管制,以及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问题,甚至需要把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以及资本流出、流入的自由化,当作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步骤。在金融市场完全开放或者部分开放的情况下,政府管理好自身债务的同时,还要实施对银行和企业借用外币债务的宏观调控。借用任何外债时,都不能只考虑近期利率成本或眼前的需要,一定要考虑到还本付息的能力。并且政府除了控制新借外债总规模和余额外,还要注意外债的币种组合和期限结构。币种过于单一,短期外债、利率不固定的长期外债太多,或大量外债集中到期,都会提高偿债的风险,增加对国内外汇市场的冲击。

六、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从传导机制看,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有三个层次:一是通常所说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扩张总需求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二是结构性政策,有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调节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率的产业之间、在高增长部门与低增长部门之间、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流动和配置,调整总支出在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之间的比例等。三是直接提高生产要素供给水平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速度的供给政策。在90年代最后几年货币和财政政策已适度扩张而仍未改变经济增长减速趋势的现实情况下,中国需要扩大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空间,应把政策选择的重点转向结构方面。

前几年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循环的障碍,在于消费相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偏低。改变这一状况的基本要求,是提高农民的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而农民收入和消费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便利农村人口的非农化,特别是城市化。为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城市化扫除障碍、创造条件,是中国最大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政策。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即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前,城市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将继续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力量。过去20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近2个亿,今后15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再有2亿处于平均消费水平的农民达到目前城镇居民平均的消费水平,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 and 经济发展水平必将再上一个台阶。

贯彻上述思路的关键政策措施是:彻底清理各地近几年因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增多而强化的形形色色抑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政策,建立起真正体现公平竞争原则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且以此促进城镇各种就业机会充分利用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促进劳动者收入的增长,进而增强劳动者通过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提高素质的积极性,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奠定人力资本的基础。作为补充的措施包括:为前些年经受过市场竞争考验的农村企业家,以及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劳动力进城创业,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包括为城镇新移民看病、子女上学及就业等创造公平的条件等;消除制约现有城镇吸纳人口能力的“瓶颈”因素;取消妨碍在交通便利,或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方设立新城市的制度和政策。

作为上述促进城市化政策的补充,是提高近期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一是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建立力度更大的转移消费制度,通过增加政府在食物、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消费转移支付,确保城镇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最低消费。这是政府